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基于系统耦合的立体性分析框架

朱德全 熊 晴

〔摘 要〕 职业教育是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基于系统论思想,构建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相耦合,制度性因素、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共同作用的“三维”立体分析框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在结构层、功能层与价值层呈现出人才供需调整、产教动态磨合以及育人理念博弈的三大实践样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应通过搭建职业教育对接乡村振兴的“信息塔”,拓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空间域”,内生职业教育引领乡村振兴的“动力源”,走向供给与需求的结构耦合、产业与职教的功能融合以及为农与离农的价值契合。

〔关键词〕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乡村振兴;系统耦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2021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明确提出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既是改善民生福祉、彰显社会公平的关键举措,更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支撑。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厚基础依然在广大农村,着力点便在于乡村振兴。在此背景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尤其是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任务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乡村振兴的根基在民族地区,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依靠产业经济的外力驱动,更需要职业教育的内驱引领。职业教育是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力量,但它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相对有限。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方面上能够发挥服务乡村振兴的作用,进而推动乡村走向高质量发展。有鉴于此,必须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态与发展路向进行分析,从而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尺度,谨防陷入“职业教育万能论”的陷阱。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立体性分析框架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具有天然联系,对于服务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仅大有可为更大

朱德全,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重庆400715);熊晴,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重庆400715)。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效果测度与长效机制研究”(BJA19010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重大成果培育性项目“新时代教育评价的发展性转向:基于《教育测量与评价》教材资源与技术平台建设”(2021-06-004-BZPK01)研究成果。

有作为,因而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何以可为”与“如何作为”的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何以可为”,即影响因素的探讨,可概括为三种观点:一是“内外因素说”,以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中心,认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受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内部因素包括办学理念、师资结构及水平、实训条件、学校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吸引力等,外部因素包括政府支持和领导重视、办学经费、社会认可度和生源质量、校企合作、办学自主权。^①二是“过程因素说”,基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动力因素、运行因素与保障因素等。其中,动力因素是指市场、政府、社会等外部力量与职业教育内部力量的共同作用,提出要发挥民族地区政府、企业、职业学校等各主体的内生动力,建立起由政府(Government)、行业(Industry)、家庭(Family)、企业(Enterprise)、学校(School)为五元发展主体构成的“GIFES”协同模式创新模式;^②运行因素指向产教深度融合,包括宏观上职校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中观上政校行企多方的深度合作以及微观上教学和生产过程的一体化;^③保障因素是指推进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④三是“功能因素说”,聚焦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基于政策高度强调职业教育的服务职能,认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其中,政治因素涉及职教“利好”政策的引导和我国二元经济政策的限制以及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碍;^⑤经济因素是指基于乡村全面振兴,农村职业教育一方面在产业带动、人才训育、技术积累、社会服务、生产转化、生态重构、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具有突出优势,现阶段在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对职业教育投入能有效提升乡村振兴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受限于乡村的经济现实问题,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偏低,还存在农业生产方式缺陷等问题;^⑥文化因素包括以民族地区特有的地理景观和文化景观为载体的民族观念、由地域和民俗带来的乡土文化、宗教信仰、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等,以及乡村职业教育本身具有的生计、生活与生态的应然价值取向。^⑦

此外,在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如何作为”的探讨上,根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已有研究普遍关注到职业教育对于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功能价值,提出构建职业院校、乡村、企业、农户和政府于一体的“CCEFG”共治模式助推产业兴旺,以职业教育带动乡村文化转型推进乡风文明,形塑职业教育四位一体“生态+”理念实现生态宜居,以治理理念、主体、工具、内容为变革路径深化治理力度。^⑧其中,主要聚焦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与贫困治理。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是对模型机制的研究,提出构建社会与产业双重网络、“制度性供给—资源性统筹—整体性治理”

①荣标:《宁夏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年第20期。

②姚树伟、谷峪:《职业教育发展动力因素分析及机制优化——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现代教育管理》2013年第12期;朱成晨:《协同与共生: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支持系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③刘海明:《产教深度融合:高职院校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

④郝天聪:《职业教育何以成为类型教育?——基于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建设的观察》,《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杨磊、朱德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业态、新问题、新方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⑤徐国庆:《我国二元经济政策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二元困境——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梁宁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机遇与优化路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⑥朱德全:《乡村“五大振兴”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罗春娜、李胜会:《中国乡村振兴的动力因素研究——基于教育的视角》,《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庄西真:《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困境的时代表征》,《教育发展研究》2016年第9期;郝耕、孙维佳:《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⑦朱德全、曾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向度》,《教育研究与实验》2019年第6期;谢元海、闫广芬:《乡村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生计、生活与生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⑧杨鸿、陈章、周永平:《产业兴旺:职教助推“CCEFG”共治模式》,《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8期;朱德全、马鸿霞:《乡风文明:职业教育“化民成俗”新时代行动逻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8期;肖幸、杨春和:《生态宜居:职业教育“生态+”教育的逻辑框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1期;沈军、陈慧:《治理有效: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改革》,《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8期。

核心驱动模型、“1+N”融合行动模式等能有效推动乡村人才振兴;^①二是对需求类型的研究,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技术型、管理型、经营型和政策型等多种人才,乡村职业教育则是培育农村各类技能型人才的主渠道,需基于乡村农业生产、社会保障、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培育“田秀才”“乡创客”“土专家”“乡村工匠”和“双创新农人”。^②在贫困治理方面,宏观上构建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框架;中观上,立足农村生计恢复力的提升,探究职业教育促进农村“空心化”治理的成效;微观上,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刻画四类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的实践样态,从治理主体、方式、规则与目标着手优化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模式。^③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大致归纳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内容范畴,但主要呈现出平面化和线性化的特征,未能深刻揭示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他组织”与“自组织”的特殊性及其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并非孤立、封闭的存在,而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间有机联系的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④因此,有必要基于系统论的思想,构建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相耦合,制度性因素、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共同作用的“三维”立体分析框架(如图1),以洞察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态,探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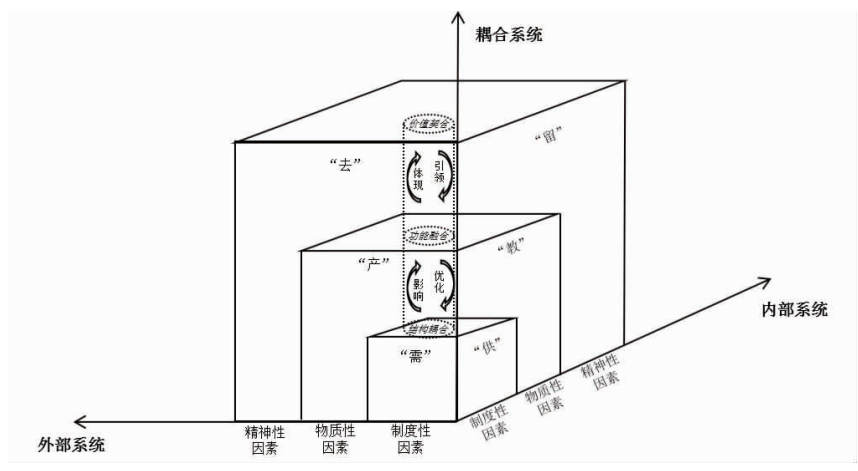


图1 影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不是职业教育单向度的线性输出,而是职业教育自身作为内部“自组织”系统与外部“他组织”系统在制度性因素、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深度耦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既是一个“自组织”,具有教育的本真诉求和自我设计与调整的功能,又是一个“他组织”,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遵循特定的实践尺度。两大系统围绕制度性因素、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进行交互作用,形成了第三系统,即耦合系统。制度性因素体现为职业教育内部供给侧与民族地区外部需求侧的交互,指向结构耦合;物质性因素表征为职业教育的教育系统与民族地区的产业系统的交互,指向功能融合;精神性因素是指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①张慧泽、高启杰:《新农人现象与乡村人才振兴机制构建——基于社会与产业双重网络视角》,《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2期;田书芹、王东强:《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驱动模型与政策启示——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实证研究》,《江淮论坛》2020年第1期;林克松、袁德桢:《人才振兴:职业教育“1+N”融合行动模式探索》,《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

②唐丽霞:《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需求及解决之道的实践探索》,《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袁利平、姜嘉伟:《关于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曾欢、朱德全:《新时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逻辑向度》,《民族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③马建富、刘颖、王婧:《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贫困治理:分析框架与策略选择》,《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1期;刘奉越:《可持续生计视域下职业教育促进农村“空心化”治理的逻辑》,《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21期;田书芹、王东强:《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模式比较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21期。

④霍绍周:《系统论》,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观念的交互,指向价值契合。在耦合系统中,结构耦合影响功能融合,功能融合则体现着价值契合;反之,价值契合引领功能融合,功能融合又优化着结构耦合。以系统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特殊性及其在结构、功能与价值方面的耦合,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引领乡村从依附发展走向内生发展或有裨益。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态

基于上述三维分析框架,对当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行动进行审视,有利于揭示出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内外系统在结构、功能与价值方面存在的矛盾张力。

(一) 结构层:职业教育涉农人才培养的供需调整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教育行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加快乡村振兴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可见,人才匮乏一直是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所在。职业教育以培养乡村所需的本土人才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但由于城乡二元机制以及职业教育内在发展的滞后性,目前职业教育的供给侧与乡村振兴需求侧之间还存在脱节,高质量的职业人才供给体系也尚未健全。一方面,表征在人才总量上。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出现“空心化”“人才饥荒”的现象。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然而,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缩小,人才流失明显,难以为乡村建设持续输送劳动力。从全国范围看,据统计,2016—2019年期间,中等职业学校(机构)数量减少了815所,中等职业学校(机构)在校生数减少了约22.54万人。以2016届到2019届的毕业生为例,在每一个三年培养周期内,中职平均流失约119.47万人。民族地区^①中职学校数量以及在校生数量也呈现出递减趋势。2016—2019年期间,民族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机构)数量减少了92所,中等职业学校(机构)在校生数减少了约19.63万人。以2016届到2019届的毕业生为例,在每一个三年培养周期内,中职平均流失约22.72万人(如图2)。^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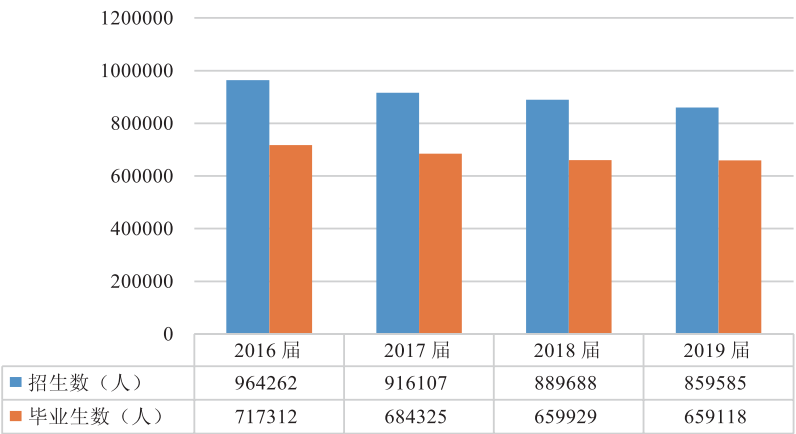


图2 2016—2019届中职学校学生流失人数(人)

^①此处民族地区指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②相关数据整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中等职业学校(机构)数”“中等职业学校(机构)学生数”。

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才素质上。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西部,西部地区不仅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整体素质水平也相对较低。一是受教育程度偏低,仅6.8%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具有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学历;^①二是人才专业水平较低,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认定的新型农民比例仅有7.5%和15.5%。^②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大量劳动力,更需要高素质的农业实用人才。目前,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占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较低,缺口仍然较大。^③但由于民族地区涉农高职院校数量较少,因而并未填补乡村对高素质农业人才的需求缺口。截止到2020年6月底,我国农林类高职院校共计54所,其中民族地区仅有11所。^④加之,涉农高职院校也并未根据区域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开设涉农专业,涉农专业的区域性与专业性不强,制约了其助力乡村的作用发挥。

涉农专业是指涉及农业等第一产业的专业类型,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其集中在农林牧渔大类,包括种植、养殖、畜牧兽医、水产等专业。据统计,这11所涉农高职,涉农专业在开设上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开设数量较少。11所涉农高职平均开设专业39个,其中涉农专业不足15个,占比仅为36.34%,与其他电子信息大类、财经商贸大类、文化艺术大类的专业相比,涉农专业的数量并不占优势。其二,专业同质化明显。80%以上的涉农高职专业设置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主要以开设农林类专业为主,其中农业类专业比重高达40.76%,渔业类最少,占比不足4%,林业类和畜牧业类则各占29.30%和26.11%,区域特色不明显(如图3)。仅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学校通过大力开设林业类专业,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特征。其三,专业创新发展不足。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未形成专业集群,目前涉农专业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农林牧渔类,如农业类以作物生产技术、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等专业为主,林业类以园林(工程)技术、风景园林设计等专业为主,畜牧业类以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动物防疫与检疫等专业为主,渔业类以水产养殖等专业为主,与学校内其他非农专业的跨界整合较少,没有形成“涉农专业+”的集群发展格局;二是未能与新产业、新技术进行结合,11所涉农高职中,仅两所学校分别开设休闲农业和森林生态旅游等新型特色专业,而大部分涉农高职专业无论是在知识结构还是教学形式上还较为陈旧,没有及时对接新的经济形态与产业类型,缺少与涉农产业链与价值链的结合,而这又与前一点密切相关。由此,容易导致乡村涉农人才同质化,无法针对性地为民族地区培养本土实用人才。从长远来看,涉农人才同质化发展会制约人才的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培养,而这正是乡村实现振兴的重要内驱力。

(二) 功能层:涉农高职跟进乡村产业的动态磨合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实现职教系统与产业系统在功能上的融合,实质是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进而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由于民族地区地理区位条件较为落后,在经济结构上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的创新驱动作用不明显,主要是能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因而就目前而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首先是要扎根本土,自上而下地“跟进”乡村产业系统。然而,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受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职业教育供求调整迟滞性的影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教育系统与乡村产业系统的矛盾愈发凸显。首先,在专业设置上,缺少扎根民族地区的优势特色专业。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2017年12月16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99.html,2021年1月2日。

②于静:《〈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出炉,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现代农业装备》2018年第6期。

③冯超、孟宪生:《涉农人才培养短板在哪》,《人民论坛》2019年第21期。

④中国高职发展智库:《农林类高职院校哪家强?全国54所农林类高职院校大盘点》,2020年8月28日,<http://www.zgg-zzk.com/redianzixun/shownews.php?id=742>,2021年1月5日。据统计,民族地区农林类高职院校共11所,其中广西3所、云南3所、新疆2所、青海1所、贵州1所、宁夏1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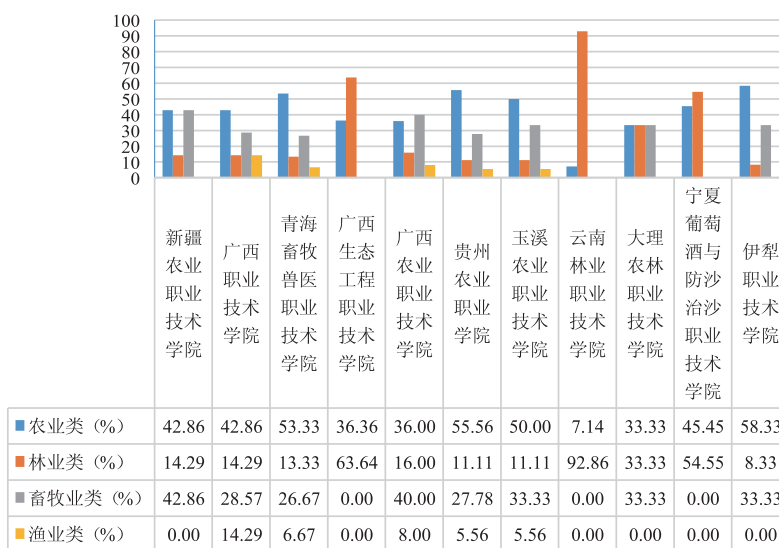


图3 民族地区11所涉农高职涉农专业类型占比(%)

如前所述,民族地区涉农高职院校稀缺已然限制了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挥,而其他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又以机械类、能源类、加工制造类为主,依赖于重工业资源,缺少对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没有根据乡村产业结构进行专业设置,诸如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在民族地区并未得到有效发展。其次,在课程内容上盲目追求城市化与技术性,割裂了与乡村的连接纽带。民族地区具有丰富宝贵的文化资源与产业集群发展的潜力条件,但职业教育未能对这些资源进行内化整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过度追求城市化的课程内容,照搬东、中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与课程教学,缺少对西部特色乡土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关照,一些民族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被排除在外;二是过于重视职业教育的专业技术性知识,但只是以简单技术的模仿学习为主,职业技术的创新性不强,而且由于缺少民族文化底蕴,未能发挥出职业教育对乡村的技术赋能作用。最后,在办学主体上职业院校与地方企业的协同作用发挥不明显。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是一种经济依附的关系,企业“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企业不愿主动与职业院校合作,并共同承担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风险,而目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仅具有简单的技术知识与操作能力,缺少在复杂问题情境中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要求。

(三) 价值层:乡村职教人才扎根乡土的理念博弈

教育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发展教育能为农村地区赢得未来的发展取得先机。^①我国民族地区集中在西部农村,民族地区的教育是一种农村教育。农村教育要始终坚守“为农而教”的价值本性,^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更是如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坚持就业导向,以培养扎根地方、服务乡村的本土人才为目标,其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才大部分涌向城市,广大农村逐渐出现“空心化”的现象。与此同时,“离农”思想不断在农村蔓延,对职业教育造成冲击。其一,“离农”思想教人离开农业,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为农”取向相悖。由此,导致职业教育涉农高校、涉农专业不断减少,即使是涉农专业的学生,也不愿从事一线农业生产工作。而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开始出现向“离农”思想妥协的发展趋势,一些农村职业

①李金刚:《教育景观视角下的农村“教育社会”构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②葛新斌:《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教育究竟能做什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学校偏离了应有的办学定位,表现得“似农非农”“似职非职”。^①其二,“离农”思想教人离开农村,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扎根本土、振兴乡村的职能相悖。“离农”思想实质是传统偏颇的教育观念的体现,一方面,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固有观念影响,职业教育成为普通教育的替代品,新一代的农家子弟不愿就读职业学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面临生源短缺的困境,导致乡村振兴直接缺少可教育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各种经济因素的“虹吸效应”作用下,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农村社会逐渐走向凋敝,而职业教育对农村经济推动的作用本就有限,在这一背景下更难以招到学生。其三,“离农”思想教人摆脱农民身份,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培养农村本土人才的目标相悖。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向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目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还亟待解决好人才供给不足、产教系统脱节以及育人思想异化的问题。因此,需基于系统论的思想,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在结构、功能与价值三重路向上的耦合,从而振兴乡村。

(一) 供给与需求的结构耦合:搭建职业教育对接乡村振兴的“信息塔”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养技术技能型农业人才,而当前制约农业人才培养的最大阻碍则是由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职业教育供给侧与乡村振兴需求侧的脱节。因此,首先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结构耦合,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的信息互通。具体而言,供给侧与需求侧要在三个阶段六个方面实现耦合。

首先是获取预测阶段,以信息预测与技术支持为主要任务,发挥信息共享功能。一方面,基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与经济规划前景,形成并发布乡村产业人才需求报告,预判各行各业人才所需从业人员的变动趋势;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建立当地职业院校可共享的人才需求信息平台,促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对乡村当地产业人才需求做到精准把控与精准对接。职业院校人才需求调研涉及人社部等部门,并非是职业院校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只有以这一系列国家基本制度为支撑,才能真正获得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数据。^②实际上,预测阶段不仅强调技术对职业教育的支撑与辅助作用,更要彰显“整合了技术知识、技术文化、技术伦理与技术治理在内的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③以此确保在信息共享中保有伦理性,体现人文性,避免走入学校办学与人才培养“唯技术”“唯数字”的歧途。

其次是培养实施阶段,以涉农学校与涉农专业建设为主要任务,发挥信息指导功能。一是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与涉农学科专业的建设力度,积极响应国家“建设100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的号召,打造涉农学校中的优质校,彰显涉农学校的特色专业。二是以涉农学科专业建设为中心,在内部构建“涉农+非农”的专业群与课程群;在外部对接乡村特色产业与新兴产业,面向“三农”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价值链”的三链同构,以此为民族地区产业急需的涉农人才培养提供保障。三是充分发挥普通高校与普通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如通过科技下乡、乡村支教、文化助农等途径,实现从单一的涉农人才培养到农业知识、技术乃至文化等的多维输送,拓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渠道,为乡村提供全方位的技术培训与技术支持。

^①祁占勇、王志远:《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实困顿与实践指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②徐国庆:《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③朱德全、石献记:《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与价值旨归》,《中国电化教育》2021年第1期。

最后是反馈推进阶段,以继续教育与技术培训为主要任务,发挥信息调控功能。深入实施《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根据当地产业对农业人才数量与素质能力的不同要求,大力推进职业继续教育,与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机构合作,对乡村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文化教育、技术扶贫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创新培训等,使其成为乡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强大后备力量。

(二) 产业与职教的功能融合:拓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空间域”

产业系统与职教系统的深度融合是一种跨界合作,不仅关联着区域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更以其复合型功能促进区域社会发展。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实现乡村从经济到文化、生态、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振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最大职能便在于以产教融合为纽带,发挥产教融合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逐步拓宽服务乡村振兴的场域,构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相融合的空间格局,助推乡村走向内生式发展。

一是发挥“产业富农”的经济功能,拓宽经济服务空间。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产业兴旺的核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主要遵循三条逻辑理路:其一,传统农业与特色产业相协调。乡村产业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包括传统的农业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和现代特色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特色产业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横跨“教育域”“职业域”“技术域”与“社会域”,以跨界融合的思想为引领,一方面是外部跨界,挖掘乡村优势资源,如特色农产品、特色传统工艺、特色景观等,开发乡村潜在特色产业,开展创意农业,构建“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是内部跨界,基于乡村传统农业,打造“农业种养—产品加工—旅游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推进特色农业产品实现“初级—中级—高级”的生产一体化。其二,产业发展与新兴技术相统一。农村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需要以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支撑,实现产业升级。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补齐乡村农业发展的短板,既要以技术转移与推广为主,强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职能,加快科技成果在农业农村的转化应用,促进农业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又要通过构建产学研科技创新联盟和农村科技创新深化机制等,推进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要素流向乡村,使乡村产业发展从被动的“技术适应”走向主动的“技术创新”,实现农业农村“自我造血式”的可持续发展。其三,农业生产与文化生态相融合。中国乡村由农业生产主导型乡村向农业生态保育、休闲旅游、文化传承、社会稳定等多功能乡村转型,^①意味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不仅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更要着眼于产业经济效益向乡村文化、生态、社会等领域的延伸。在产教融合中,跳出经济看经济,挖掘乡村产业经济背后的文化因素与生态因素,打造独树一帜的文化产业与生态产业,激活乡村文化经济与生态经济,实现乡村经济、文化与生态的共生耦合。

二是发挥“资源亲农”的文化功能,拓宽文化服务空间。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存续的根与魂,乡村振兴的内核是一种文化内生力的唤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立足“三农”,扎根于乡村文化,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通过资源的转化与创生,拓宽了服务乡村振兴的文化空间。具体而言,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文化学习空间,产教融合有机整合了学校空间与企业空间、农业资源与教学资源,并依托于现代学徒制,将人才培养的空间从学校拓展到农业企业和“田间地头”,^②跳出了学校的“围城”,在办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上走进“三农”;第二种是文化治理空间,产教融合的本质是学校、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由此,借助多元主体的力量,有效整合主体间的资源利

^①陈秧分、刘玉、李裕瑞:《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态与产业兴旺途径》,《地理研究》2019年第3期。

^②马新星、朱德全:《发展现代学徒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路径探寻》,《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21期。

益,形塑乡村命运共同体以推进乡村治理,实现由职业院校的“小治理”到乡村社会的“大治理”,构建和谐有序、风清气正的美丽乡村;第三种是文化产业空间,在产教融合中挖掘乡村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经济价值,通过融合产业与文化、产业与生态、文化与生态,将乡村环境、生态景观、民族人文等融入产业经济,构建“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乡村产业链、产业功能区域、生活功能区域及乡村生态景观的空间集聚,^①有效将乡村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与精神文化。

三是发挥“科技兴农”的生态功能,拓宽生态服务空间。科技的迅速发展促进带动了农业现代化,丰富了农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但科技对于农村环境的改善作用则最易受到忽视。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然而当前乡村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极大程度地制约了乡村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重在发挥科技供给与转化的作用,加快科技兴农,助力实现“乡村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修复乡村环境,职业院校从学校定位、专业开设到人才培养要彰显“涉农”特色,根据乡村环境的突出问题,准确定位、细化分类、精准施策,充分利用生态科技手段,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修护自然生态环境,将乡村打造成为宜养宜居、宜产宜教的美丽家园;其二发展绿色农业,一方面因地制宜,根据区域的资源禀赋与优势条件,优化农村产业布局,以特色农产品开发带动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现代农业先进技术,建立农业科技园,改进传统农业耕种栽培、畜牧饲养、水产养殖等技术,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增强农产品科技含量,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推进从绿色生产、绿色加工到绿色经营、绿色消费的全链发展;其三,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科技兴农不仅是表层的技术驱动,更体现在思想层面的价值引领,通过不断发挥科技的供给促进与转化应用的作用,在推进乡村实现绿色转型的同时,强化科技的研发与创新作用,通过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平台搭建、创新人才输送与创新资源集聚,增强乡村自主创新能力,由“科技驱动”转为“引领科技”,实现内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三）为农与离农的价值契合:内生职业教育引领乡村振兴的“动力源”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虽然直观表现为制度性建设或物质性帮扶,但不能缺少精神性的价值引领。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必须激活内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协调“为农”与“离农”的博弈关系,从思想观念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一方面,贯彻与渗透新发展理念。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引领乡村振兴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思想之基与动力之源,着力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愿景。一是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打造职教、产业、科技、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增强农业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二是以协调发展为关键,将职业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系统统一起来,推进人才、技术、价值、资源、信息等要素与五大振兴的同频共振,实现整体性与系统性发展;三是以绿色发展为基础,坚持技术精准供给与人文思想教化双管齐下,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朝向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乡村;四是以开放发展手段,将职业院校、产业、企业作为乡村发展空间,变农田耕地、种植林地 of 职教科研基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对外开放,加快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流向农村,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五是以共享发展为目的,发挥职业教育多元主体的作用,构建乡村“共参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增强农民在服务农业农村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期待。

另一方面,树立“为农”“爱农”的发展观,赋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乡村振兴是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作为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新型农民不仅“新”在技术手段的应用层面,更“新”在理念文化的价值层面。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

^①杨亚东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与对策》,《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年第3期。

既要授人以一技之长,更应通过树立“为农”“爱农”的发展观,以人才振兴带动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构筑乡村社会整体化、系统化、协同化的发展格局。其一,要求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明确为“三农”服务的办学定位。以培养具有农业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在专业设置上适当增加涉农专业,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上与企业、农技站密切合作,将学校办到“田间地头”上,解决农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学习与工作、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其二,建立农业人才的激励机制。职业院校对人才的激励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举办面向农民的职业技能大赛等活动进行精神激励,二是通过增加职业学习的津贴补助和提高工资待遇等物质激励,为农业实用人才扎根农村、服务农村提供生活生产保障。其三,推进职业院校内外跨界合作,增强农业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既要内部跨界,与政府、企业、行业、农户等联合建立一批产教融合基地,为农业人才搭建发展平台,并且满足农民创新创业的需求,使农业人才留在乡村大有可为更大有作为;又要外部跨界,与城市从学校发展到产业布局再到经济规划等方面相统筹,吸引城市人才下乡服务与下乡消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强化农业人才留在乡村并继续服务乡村的发展动力。

(责任编辑:程天君)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Vitalization in Ethnic Region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System Coupling

ZHU Dequan, XIONG Qing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key force to serve the rural 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Based on the idea of system theory, we can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in which the internal systems and external systems are coupled, and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material factors, and spiritual factors work together. It is found tha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serving rural vitalization presents three practical patterns of adjustment at 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 and value levels, involv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alents, the dynamic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 concepts. Through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tower” to connec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rural vitalization and broaden the domain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serving rural vitalization can achieve the structural coupl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value convergence between “serving the countryside” and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Keywords: ethnic regions;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system coupling

About the authors: ZHU Dequan, PhD in Education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Changjiang Scholars Program, is Dean,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XIONG Qing is PhD Candidate Specializing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t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